

汪暉：亞洲想像的政治（二）

二、民粹主義與"亞洲"的雙重性

在福澤諭吉發表他的《脫亞論》二十六年之後，中國辛亥革命爆發了。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不久，俄國革命的領袖列寧連續發表了《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1912）、《亞洲的覺醒》和《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1913）等文，歡呼"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正在洶湧澎湃地發展"，[23]詛咒"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憲法完備的文明先進的歐洲"正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支持一切落後的、垂死的、中世紀的東西。"[24]列寧的判斷是他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按照他的觀點，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世界各地的被壓迫民族的社會鬥爭就被組織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範疇之中了。這一將歐洲革命與亞洲革命相互聯繫起來進行觀察的方式可以追溯到馬克思 1853 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的文章《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列寧與福澤諭吉的相反的結論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共識之上，即亞洲的近代乃是歐洲近代的產物；無論亞洲的地位和命運如何，它的近代意義只是在與先進的歐洲的關係中呈現出來的。列寧把俄國看作是一個亞洲國家，但這一定位不是從地理學的角度、而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的方面、從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進程方面來加以界定的。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他說："俄國在許多方面無疑是一個亞洲國家，而且是一個最野蠻、最中世紀式、最落後可恥的亞洲國家"。 [25]儘管列寧對中國革命抱有熱烈的同情態度，但當問題從亞洲革命轉向俄國社會的內部變革時，他的立場是"西歐派"。 19 至 20 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將俄國精神視為東方與西方、亞洲和歐洲兩股力量的格鬥和碰撞。在上述引文中，亞洲是和野蠻、中世紀、落後等概念聯繫在一起的範疇，然而恰恰由於這一點，俄國革命本身帶有深刻的亞洲性質（即這一革命針對著俄國這一"亞洲國家"所特有的"野蠻的"、"中世紀的"和"落後可恥的"社會關係）而同時具有全球性的意義。

亞洲在世界歷史修辭中的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社會主義者對於亞洲近代革命的任務和方向的理解。在閱讀了孫文的《中國革命的意義》一文後，列寧對這位中國革命者提出的超越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綱領進行了批評，他指出孫文的綱領是空想的和民粹主義的。在他看來，"亞洲這個還能從事歷史上進步事業的資產階級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會支柱是農民"，因而它必須先完成歐洲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而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問題。他嫻熟地運用歷史辯證法，一方面斷言孫中山的土地革命綱領是一個"反革命"的綱領，因為它背離或超越了歷史的階段，另一方面又指出由於中國社會的"亞洲"性質，這個"反革命的綱領"恰

恰完成了資本主義的任務："歷史的諷刺在於：民粹主義為了'反對'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竟然實行能夠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得到最迅速發展的土地綱領。"[26]

列寧對中國革命的認識產生於他對 1861 年俄羅斯改革、尤其是 1905 年革命失敗所做的長期思考。1861 年，在與英、法進行的、以爭奪巴爾乾地區和黑海控制權為目的的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亞歷山大二世推行了廢除奴隸制改革。如果以最為簡略的方式勾勒這場改革的特點的話，那麼，我們不能忽略如下兩點：第一，這場改革不是源自俄國社會內部，而是產生於外部壓力；第二，1861 年 2 月 19 日頒布的《解放法令》是在充分保證地主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的，俄國農民卻為了這個由上至下的俄國工業化過程而承擔了沉重的代價。列寧斷言 1861 年產生了 1905 年，其原因即在此。[27]從 1861 年改革到 1905 年革命，土地集中的現象並未產生出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而是導致了公社農民要求沒收地主土地並將它們重新歸還給他們的強烈要求。[28]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列寧對 1905 年革命的總結和思考與如何解決俄國土地問題密切地聯繫在一起。1907 年，列寧撰寫了《社會民主黨在 1905 年--1907 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文，[29]以俄國土地問題為中心，提出了農業資本主義的兩種模式即"普魯士道路"和"美國道路"，所謂"普魯士道路"即通過國家與地主階級的聯合，以暴力方式剝奪農民，摧毀村社及其土地佔有製，最終將農奴主-地主經濟改造為容克-資產階級經濟，而"美國式道路"則是"可能有利於農民群眾而不是有利於一小撮地主"的土地方案，"就是土地國有化，廢除土地私有製，將全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擺脫農村中的農奴制度，正是這種經濟上的必要性使俄國農民群眾成了土地國有化的擁護者。"通過對俄國土地改革和 1905 年革命為什麼會失敗的總結，列寧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在俄國社會條件下，"土地國有化不僅是徹底消滅農業中的中世紀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30]

列寧認為，俄國民粹派的土地綱領勢必引導俄國重新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小農經濟制度，而這種經濟制度無法提供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他贊同"美國道路"，一是因為只有通過土地的國有化，擺脫中世紀的土地關係，才能提供發展農業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二是因為俄國存在著大量的未開墾土地，從而存在著走美國道路而不是其他歐洲國家道路的條件。發展資本主義的農業必然包含了對舊有的社會關係的強制性的改造，"在英國，這種改造是通過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的，但是這種暴力有利於地主，暴力手段的對像是農民群眾"；"在美國，這種改造是通過對南部各州奴隸主農莊施行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的。在那裡，暴力是用來對付農奴主-地主的。他們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產變成資產階級的小地

產。對於美國許多'空閒'土地來說，為新生產方式（即為資本主義）創造新的土地關係這一使命，是由'美國土地平分運動'，由 40 年代的抗租運動（**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來完成的。"[31]"民粹主義者以為否定土地私有製就是否定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對土地私有製的否定表達了最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32] 正是從這一視野出發，列寧看到了孫文的革命綱領中所具有的真正的革命潛能，他驚嘆這位完全不了解俄國的"先進的中國民主主義者"簡直像一個俄國人那樣發表議論，提出的是"純粹俄國的問題"："土地國有能夠消滅絕對地租，只保留級差地租。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土地國有就是：盡量剷除農業中的中世紀壟斷和中世紀關係，使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使農業有最大的可能適應市場。"[33] 與此相對照，"我國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在批評'土地平分'、'土地社會化'、'平等的土地權'的時候，卻局限於推翻這種學說，從而暴露了他們蠢笨的學理主義觀點，他們不能透過僵死的民粹主義理論看到活生生的農民革命的現實。"通過把孫文的革命綱領放置在俄國特定的歷史背景中考察，列寧得出了"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獲得勝利，而土地革命不實現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歷史使命的" [34]這一結論。如果說"美國道路"區別於"普魯士道路"和"英國道路"的特徵是它的國有化方案，那麼，"中國道路"卻代表著一個自下而上的"農民土地革命"。

俄羅斯的改革是在克里米亞戰爭、1905 年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展開的，列寧對於俄國改革道路的思考因此也不能不與歐洲帝國主義所創造的國際關係聯繫在一起。如果俄國的土地問題必須通過"國有化"的方式來解決，那麼，怎樣的"國家"才能擔當這個改革的重任？列寧說："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通例和'常態'，而民族複雜的國家是一種落後狀態或者是例外情形。.....這當然不是說，這種國家在資產階級關係基礎上能夠排除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這只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些產生建立民族國家取向的強大的經濟因素。這就是說，從歷史的和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上所談的'民族自決'，除了政治自決，即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以外，不能有什麼別的意義。"因此，當列寧談論"亞洲的覺醒"的時候，他關心的不是社會主義問題，而是如何才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政治前提的問題，亦即民族自決的問題。在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民族-國家"與"民族狀況複雜的國家"（亦即"帝國"）構成了對比，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而後者則構成了民族-國家的對立面。第二，民族自決是"政治自決"，在俄國和中國的條件下，以一種社會主義的方式形成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條件--亦即政治民族或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是"政治自決"的必然形式。"資本主義使亞洲覺醒過來了，在那裡到處都激起了民族運動，這些運動的趨勢就是要在亞洲建立民族國家，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最好

的條件。"[35]在"亞洲"的特定條件下，只有通過農民土地革命的方式和社會主義的建國運動才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前提，因此，必須拒絕一切與解放農民、均分土地相對立的改革方案。

沒有任何必要誇大第一次中國革命對於俄國革命的影響。事實上，我們不能確定兩者之間的任何直接的影響關係，相反，我們能夠確定的是產生於歐洲戰爭的直接背景之下的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刻的和明確的影響。列寧對於辛亥革命的重視是在他對於國家問題、社會主義運動和人民民主專政的長期的思考脈絡中展開的。[36]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如下兩個事實：第一，十月革命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由此開創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對亞洲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的回應。1925 年，為悼念孫文逝世，後來擔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拉狄克在《真理報》發表文章，其中特別提到如下事實："一九一六年的一天，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殷，一些布爾什維克在伯爾尼集會討論民族自決問題。列寧在會上突然提議，布爾什維克將來應和中國革命聯合起來。這一提議當時似乎是一種癡人說夢！真想得出來，俄國無產階級會同億萬中國人並肩戰鬥。在與會的五六個布爾什維克當中有人想像說，如果他們命長，也許會看到這個夢想實現。"[37]這個材料證明：中國革命在列寧構想民族自決的思想和未來俄國革命的方向上有著持續的影響；蘇聯在二十年代對孫文和國民黨的支持及促成國共合作的努力與列寧對於第一次中國革命的看法有著密切的關係。[38]從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角度說，中國的第一次現代革命也標誌著如下事實，即在亞洲社會的條件下，反對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向民族自決運動的方向轉變。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理論（1914）、關於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的革命的意義的解釋，都產生於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後，並與他對中國革命的分析有著理論的聯繫。第二，俄國革命對歐洲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和持久的影響，它可以視為將俄國與歐洲分割開來的歷史事件。列寧的革命的判斷與斯密、黑格爾對於亞洲的描述沒有根本的差別：他們都把資本主義的歷史表述為從古老東方向現代歐洲轉變的歷史進程，從農耕、狩獵向商業和工業的生產方式轉變的必然發展。但在列寧這裡，這一世界歷史框架開始包含雙重的意義：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和由它所激發的 1905 年的俄國革命是喚醒亞洲——這個長期完全停滯的、沒有歷史的國度--的基本動力，[39]另一方面，中國革命代表了世界歷史中最為先進的力量，從而為社會主義者標出了突破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明確出口。俄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中間曾經長期存在著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持久論戰，[40]列寧作為"西歐派"的一員通過對於"先進的亞洲"與"落後的歐洲"的辯證對比，構造了一種"脫歐（帝國主義的歐洲）入亞（落後地區的革命先進性）"的新型邏輯（從尋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角度看，這個"脫歐入亞"路線也仍然內在於"

脫亞"的邏輯)。也正是在這個邏輯之下，中國革命提供了一種將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方式相結合的獨特道路--這一獨特道路為一種新型的革命主體的出現提供了前提，我在這裡指的是以中國農民為主體的工農聯盟。

三、社會革命視野中的"大亞洲主義"

列寧的上述論斷為我們理解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亞洲問題的關係提供了基本的線索。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最初曾以"興亞"、"振亞"為方向，但很快就與擴張主義的"大陸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大東亞"構想糾纏在一起。在這一陰影之下，中國、朝鮮或其他亞洲國家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不可能對產生於近代日本的形形色色的"亞細亞主義"表示任何的興趣。

中國革命者章太炎、李大釗、孫文等人有關亞洲問題的幾篇有限的文章都是在與日本發生關聯的語境中產生的。對於他們來說，亞洲的問題是和中國革命、社會運動和民族自決直接相關的。1901年底，在日本東邦協會的機關刊物《東邦協會會報》上，孫文發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針對日本正在流行的"支那保全論"和"支那分割論"，他明確提出"從國勢上講沒有保全的理由，從民情上講沒有分割的必要"--"沒有保全的理由"，是因為從革命政治的角度說，清朝國家政治與人民相互割裂；"沒有分割的必要"，是因為從革命政治的角度說，革命本身的目標之一正是實行民族自決。[41]1924年，在他最後一次訪問神戶之際，孫文再次應邀發表了有關亞洲問題的演講，這就是著名的《大亞洲主義》。[42]在演講中，他含混地區分了兩種亞洲：一個"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作為"最古文化的發祥地"的亞洲與一個即將復興的亞洲。如果說前一個亞洲概念與列寧所說的民族複雜的國家狀況具有內在的聯繫，那麼，亞洲的復興的起點或復興的亞洲又是什麼呢？孫文說，這個起點就是日本--日本在三十年前廢除了一些不平等條約，成為亞洲第一個獨立的國家。換言之，這個起點與其說是日本，不如說是民族-國家。孫文為日俄戰爭的爆發和日本的勝利而歡呼："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什麼希望？答案是："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43]在這裡，孫中山提及了一個微妙的概念，這就是"全部的亞洲民族"——一個不單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的亞洲，而且也是一個包含了各個獨立民族-國家的亞洲，不單是儒教文化圈的東亞，而且是多元文化的亞洲。"亞洲民族"的整體性建立在主權國家的獨立性的基礎之上。"全部的亞洲民族"是民族獨立運動的產物，但不是對於歐洲民族-國家的拙劣模仿。孫文堅持認為：亞洲具有自己的文化和原理——所謂區別於歐洲民族-國家的"霸道的文化"的"王道的文化"。他的演講題為"大亞洲主義"，部分地

是由於他將亞洲的概念與"王道"的概念結合起來。如果把他的演講與帝國主義的亞洲觀加以對比的話，那麼，他的亞洲概念雖然保存了與"王道"、"仁義道德"等儒教概念的聯繫，但並不是一個以同質性的文化為核心的亞洲，而是一個由平等的民族國家組成的亞洲。按照這個亞洲概念，亞洲的內在統一性不是儒教或者任何單一的文化，而是一種政治文化，一種能夠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和社會的政治文化。在這一政治文化範疇內，他提及了中國、日本，談到了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不丹和尼泊爾，以及中華帝國的朝貢關係。文化的異質性是這一亞洲概念的主要特點之一，而民族範疇為亞洲概念內含的異質性提供了載體。在孫文的語境中，文化異質性提供了民族-國家的內部統一和拒絕外來干涉的歷史根據。 [44]

孫文在演講中談到了中國的朝貢模式，但這絕不是為了確認中國對於周邊的霸權或中心地位，而是為了論證"王道"的必要性。在"大亞洲主義"的語境中，作為一種規範性的論述，孫文的"王道"概念是與殖民主義的"霸道"邏輯相對立的。孫中山相信朝貢模式中包含了對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性的相互承認，從而現代國家可以從中發現一些超越帝國主義政治的文化資源。他談及尼泊爾對中國的朝貢，不是為了重溫大中華之舊夢，而是確信在這一關係中包含著相互承認和相互尊重的平等關係。孫中山支持東南亞各國的民族解放和獨立的運動，他的亞洲觀與民族獨立的理念在這些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5]孫文期待的是把帝國文化中的多元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新型關係結合起來，從而抵制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和現代民族-國家的高度的文化同質化傾向。他為我們勾畫的亞洲圖景是：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內部則包含了以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和其它文化為主體的民族-國家。 "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 [46]這個"王道的文化"是"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和平等解放的文化。" [47]孫文清晰地看到了民族主義與種族觀念的關係，也看到了民族主義的反抗邏輯包含著導向它的另一面的邏輯，即壓迫和強權的邏輯。因此，他在訴諸種族觀念為民族獨立提供合法性的同時，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命題。 "大亞洲主義"或"汎亞洲主義"命題是日本近代的"大東亞主義"的反論，它以一種文化多元主義的面貌對於高度同質化的"東洋"概念提出了批判。 [48]正由於此，"大亞洲主義"是一種通過民族自決來超越帝國主義的構想，也是一種超越種族、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單一性的多元民族主義。

"大亞洲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密切聯繫正是建立在這一邏輯之上的，孫文一方面用種族觀念定義亞洲，另一方面又通過將俄國的解放運動視為"大亞洲

主義"的同盟來超越種族的分界。他說：

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歐洲人都視他為毒蛇猛獸，不是人類，不敢和他相接近，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都是這一樣的眼光。這個國家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為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他要講仁義道德，不願講公理強權；他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像這個情形，俄國最近的新文化便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所以他便要來和東方攜手，要和西方分家。 [49]

在這裡，黃種、白種不是絕對的尺度，十月革命之後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才是真正的尺度--"大亞洲主義"就是一種與此相互呼應的被壓迫民族的"民眾解放的運動"。如果我們把孫文的文本與 1919 年李大釗發表於《國民》雜誌上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和《再論新亞細亞主義》相互參照，那麼，他們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槓桿、以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為背景所展開的以民族自決和國際主義為內核的亞洲觀是一脈相承的。李大釗認為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以亞洲門羅主義的方式展開的"大日本主義"，其實質"不是和平主義，而是侵略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而是吞併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而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組織。"[50]他的"新亞細亞主義"包含了兩個要點："一個是在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沒有破壞之前，我們亞洲的弱小民族應該聯合起來共同破壞這個大亞細亞主義；另一個是在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既經破毀以後，亞洲全體民眾聯合起來加入世界的組織--加入世界的組織那時可以成立。"[51]他們重視的不是國家間的聯合，而是"全體民眾"的聯合，從而區域或世界的組織必須是一種以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為前提的"民眾的大聯合"。 [52]

列寧、孫文、李大釗對於"亞洲"的理解是和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方向的理解密切相關的。就列寧的亞洲觀而言，我們可以清晰地看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對於亞洲的特殊規定（一個中世紀的、野蠻的、沒有歷史的亞洲）與革命的邏輯的綜合。這個黑格爾+革命的亞洲概念不僅包含了古代（封建）、中世紀（資本主義）、現代（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範式，而且突出了"亞洲"（尤其是俄國和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的獨特位置，強調了在以農民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發展資本主義的獨特道路。國家的問題是在雙重的意義上被論證的，即一方面在帝國主義的國際秩序中尋求民族自決，另一方面必須讓國家及其暴力朝著有利於農民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展開。這兩個方面共同構造了一種看待亞洲社會特性的革命視野，在這個視野裡，構成亞洲之為亞洲的不是從儒學或某種

文明類型中抽繹出來的文化本質，而是亞洲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的特殊位置--這個特殊位置不是產生於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的敘述，而是產生於有關亞洲社會內部的階級構成和歷史傳統的動態分析。

正因為如此，社會革命的視野與近代歷史中出現的各種文明論的、文化主義的和國家主義的"亞洲"敘述有著極大的差異，它的焦點集中於對不同的社會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社會革命的推動者追問的問題是：以土地關係為中心，農民、士紳階級、新興資產階級、軍閥和城市工人之間是怎樣的關係？正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論文中所展示的那樣，這種有關階級構成的分析不是結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從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的視野出發的。這些革命運動的參與者並不是一般地追問特定社會群體的財產佔有比例，而是力圖說明這些不同的群體對於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的態度和潛在的力量。因此，與其將這樣的"階級分析"理解為階級分析，不如說成是一種在階級分析構架下的動態的政治分析--政治分析的特點是重視主體的能動性，忽略了這一點也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近代中國的階級變動中上層家庭的分子有可能成為革命運動的骨幹力量；也不能理解為什麼帝國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有可能成為被壓迫民族的堅定朋友和同志--對於能動的主體而言，國際主義與其說產生於對於民族認同的拒絕或遺忘，毋寧說產生於一種將自身民族的解放與其他民族的解放關聯起來的政治意識或政治自覺。如果將這種社會革命的政治視野引入對於"亞洲"的分析之中，那種關於"亞洲"或"東洋"的總體性規定或靜態描述也必然不再有效，因為"政治分析"的視野要求的是對國際關係和不同社會的內部關係的動態分析，即從社會革命的角度追問：在這個歷史運動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敵友問題既包含在國內關係之中，也包含在國際關係之中。

按照馬基雅維利的古老說法，"政治"與一種能動的主體性或主體的能動性相關。政治的視野既需要將認知者的主體置於這一視野內部，又需要從這個視野中分辨出不同的能動的主體，進而尋找敵友，判斷社會的運動方向。"政治視野"永遠是一種"內部的"視野，一種將自身放置在敵友關係的動態變化之中的視野，一種能夠把對亞洲、中國、日本、俄羅斯的認識與思想者或革命者的政治行動密切關聯起來的視野。這一視野的最為有力之處，就在於它能夠超越國家主義和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的框架，從不同的社會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量；在這個視野之下，對立或聯合的問題不是建立在國家關係或民族關係的固定框架內，而是建立在對於各自社會的內部力量及其可能的動態關係之中。為了說明這種政治視野或政治分析的特點，我們不妨將之與丸山真男在討論福澤諭吉時所使用的"國家理性"（也許也應該包括這一概念的對立面，即"國家非理性"）這一概念加以對比。

按照丸山真男的看法，福澤諭吉在思想史上的貢獻之一是闡發了適應時代需要的"國家理性"，從這種"國家理性"的角度看，日本現代史上的那些排外或擴張主義均可視為缺乏或者背叛這一"國家理性"的結果。換言之，在福澤諭吉那裡，最大的政治莫過於建立真正的"國家理性"。卡爾·施密特在他的那部如今常常為人引用的著作《政治的概念》的開頭說："國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為前提。""無論如何，'政治的'一般而言是與'國家的'相互並列，或者至少是與國家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但是，"國家等於政治"的公式並不能代表政治的永恆形態，"恰恰在國家與社會相互滲透之時，國家=政治這個共識就變得謬誤百出，充滿欺騙性。"他提出這一點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在民主化組織體制下必定出現這種情況。"[53]我在這裡對國家與政治作出區分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解釋民主化組織體制的特點，而是為了理解俄國和中國的革命時代中的政治實踐。在社會革命的語境中，"政治"存在於不同能動的主體之間，存在於階級、階層、政黨的自覺意志的較量之中--這些力量力圖影響、支配、塑造或者控制國家的權力，但國家並沒有絕對的能量將"政治"包裹在它的"結構-功能"的運轉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國家=政治的公式（亦即能動的主體已經轉化為國家權力學的"結構-功能"要素的狀態）並不能被描述為一種常態，它毋寧是一個（政治領域自身的）去政治化過程的產物。

與"國家理性"的分析視野不同，社會革命時代的"政治認識"不是在一種規範性的意義上談論政治主體（如國家）的行動方式，而是從"能動的政治主體及其相互運動"的視野展開歷史運動的實態和方向。這種方法要求認識者將自身轉化為一個"能動的主體"，即將自身或自身所代表的利益關係置於政治分析的棋局之中，進而產生出政治性的召喚。列寧在孫文的中國革命綱領中看到了中國革命與"純粹的俄國問題"之間的聯繫，他進而提出了民族自決的綱領，展開了革命力量必須依靠誰、反對誰、建立怎樣的國家才能在"亞洲"發展資本主義的思考。社會主義與國家的結合這一政治選擇正是這一政治分析的產物。與之相類似，宮崎滔天、北一輝等日本知識分子基於中國的自立與解放是亞洲解放以致人類解放的必要步驟的認識，以不同的方式或者參與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之中，或者對中國社會的運動進行直接觀察，並展現出相當深刻的政治分析和政治行動能力。在辛亥革命之後，"北一輝看到的是日本的外交路線中極其悲慘的英國追隨主義。"他對日本的"支那保全論"的分析是真正政治性的：日本如果介入六國借款團，"學歐洲各國之經濟瓜分"，不就是"於保全的名義下，扮演走狗，行瓜分之實"嗎？如果要真正落實"保全主義"，就必須促成中國的自立和民族的覺醒，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與亡國亡種的軍閥劃清界限，進而與中國的"革命派新興階級"實行聯合。那種在"保全支那"的名義下向軍閥借款的方式毋寧證明了日本的國家政治與財閥的擴張要求之間的聯繫。[54]北一輝支持並參與孫文的革命，但對於孫文接受日

本財閥的借款並過多依賴外援的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他分不清"戰爭與革命"的區別。 [55]在他這裡， "解放亞洲"的理想（亦即他的"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革命"、"改造日本"的問題產生了極為密切的、無法分割的關係，在這一政治性的視野之中，不但"亞洲"這一概念的抽象性徹底地消退了，而且中國和日本都不再是一個整體性的、不可分析的概念。

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的例證：1919年6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論》發表《切勿謾罵北京學生團之行動》一文，他透過曹汝霖、章宗祥的"親日派"形象與學生運動的"排日之聲"的表面現象，得出了"欲於支那根絕排日之不祥事，其策不在援助曹章諸君以購民間之不平，而在於我國自身先知軍閥財伐之對支政策"[56]的結論--在我看來，這個視野是"政治的視野"；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二年，南京政府被迫遷往重慶，尾崎秀實從這一事件中看到了共產黨影響的深入和浙江財閥之影響力的衰落，進而得出了"此加速了支那近代歷史賦予的民族解放的要求，民族解放運動已經作為國民政府的指導和國民政府勢力所難以控制的力量開始發展起來了"，[57]"支那的'赤化'，是由支那特殊的複雜性及其特殊的內容決定的，我想不一定就非要將它考慮成是與蘇聯同類型的東西"[58]--在我看來，這個解釋是"政治性的解釋"；盧溝橋事變之後，橘樸檢討自己的中國認識時說："目光只注視在作為客體的中國方面，努力地科學地把握其諸條件，而對至關重要的主體的諸條件卻考慮得太淺了。這是怎麼回事，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夠設定這一關係嗎？我不得不重新出發"[59]--在我看來，這種重新找回"主體的諸條件"以認識中國的方式也是一種"政治性的認識方式"。

從思想史的角度說，上述人物的中國認識或亞洲觀最終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偏離了最初的航向，根本的原因在於：面對強有力的國家政治，他們無法把上述分析方式貫徹到底，亦即在"國家"面前，作為政治視野的核心的"能動的主體性"消失了--這一思想者和行動者的悲劇讓我想到一位歐洲歷史學家的論斷的重量：如果要為19世紀以降的世界歷史確定一個最為中心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民族國家。在閱讀野村浩一教授關於宮崎滔天的思想與行動的研究時，我注意到他的分析是從"宮崎的雙重悔恨"開始的："1、自己為什麼作為日本人而沒有作為中國人參加這場革命呢？..... 2、在將全身心奉獻給'支那革命'以前，為什麼沒有致力於'日本的改善'呢？"他接著對此發表了極具洞見的分析："身處中國革命之中，'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兩者之間的問題，還有，'改造日本'與中國革命之間的問題，這包含在滔天悔恨中的兩大問題，可以說受到了明治以來至大正年間的政治形勢的很深的影響。對於全力傾注於中國革命的滔天來說，因兩國之間的關係而給他帶來的'被撕裂'般的悲劇心理，正是他產生這種悔恨的最基本

的要因。"[60]在引用了晚年滔天對於天皇和日本國體的讚譽之詞之後，野村評論說："滔天作為一個明治時代的人，他也終於沒有能夠逃脫天皇制國家這一咒語的束縛。"[61]比滔天走得遠得多的是北一輝，他一方面將日本國內的革命性改造作為解放亞洲的前提，另一方面又聲稱"支那、印度七億同胞實際上如果沒有我們的維護與扶持是無法獨立的……當歐美革命論的權威們都站在這種膚淺的哲學立場上，不能領會'劍的福音'時，高瞻遠矚的亞細亞文明中的希臘，率先構築了自身的精神。……忌諱武裝國家之人，其智見宛如幼童。"[62]在這裡，北一輝沒有將他關於"改造日本"的政治思考貫穿到帝國主義時代的中日關係之中，卻不加分析地將日本作為亞洲的武力解放者。正如他在 1903 年將日俄戰爭視為"黃白人種的決戰"一樣，[63]國家和人種等概念阻斷了他對自己社會的政治分析，以致今天的人們能夠輕易地發現他的"理想中的日本作為'無產者'、'革命國家'的形象與現實中的日本'殖民主義者一員'的形像出入甚大。"[64]當三十年代後期的尾崎秀實在日本對亞洲入侵的背景下鼓吹"東亞協同體"論的時候，或者，當橘樸在"九一八"事變後將他對中國社會機體的分析置入他對滿洲國的"分權性自治國家"的設想之中時，我們從他們的分析方式中看到是"國家等於政治"的公式，看到的是與他們曾經長期堅持的那種政治分析方式的背離--政治分析在"日本帝國"的門口以不同的方式停止了。從社會革命的視野來看，這正是"政治的國家化"--在這個時刻或瞬間，思想者與他們曾經作為改造對象的"日本帝國"的陰影重疊在一起了。

在孫文和列寧的構想中，民族自決的命題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綜合，即它一方面要求建立作為發展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強調這個建國過程同時是以社會革命的形式改造傳統帝國關係的過程。社會主義者認為弱小民族的自決要求總是包含著一定程度的民主要求，從而他們對於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總是與對民主力量的支持相關的。在這個國際主義與民族自決的綜合思考中，其實並沒有給"亞洲"這樣的範疇留下多少空間——亞洲僅僅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邊緣區域，一個通過民族革命才能加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因而也加入到反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鬥爭中的地理區域。如果要討論社會主義思想與大亞細亞主義的關聯，那麼，在近代語境中，它們均與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有著歷史的關聯。社會主義的民族-自決權思想建立在歐洲近代思想中的那種"帝國-國家"二元論中，而那些在"大亞細亞主義"的口號下推動建立滿洲國或其他形式的"殖民主義的自治政府"的努力也同樣如此，他們以主權、獨立、自治的概念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包括在進步論的頭飾之下。上文涉及的日本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抱有真誠同情、對中國社會運動具有深刻洞察，但為什麼連北一輝這樣具有深刻洞見的人也最終皈依了曾經加以批判的國家體制、甚至倒向帝國主義侵略政

策呢？我在這裡無法進行詳盡的探討，但下述兩個要素也許可能提供某些解釋的可能性：第一，現代日本並不存在社會革命的條件，從而這些敏銳的知識分子無法將他們通過中國革命的觀察而獲得的政治視野貫徹到日本社會內部；第二，在缺乏上述社會條件的背景下，社會主義思想無法形成超越近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動力。

伴隨著中國革命和亞洲民族解放浪潮的終結，那種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的政治視野、那種能夠將俄國、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社會運動關聯起來的政治分析方式也終於式微了。七十年代末期以降，隨著六十年代社會運動的衰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告一段落，我們處於一個"去政治化"的時期--一個國家機制逐漸將能動的主體性或主體的能動性納入"國家理性"和全球市場的軌道之中的過程。當"亞洲"問題再次成為許多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之時，我們幾乎找不到上個世紀的那些革命者們所擅長的、通過將自身融入革命歷史而獲得的那種將不同社會關聯在一起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這個時代裡，有關亞洲問題的討論與區域性市場、以反恐為中心的區域同盟以及金融安全等為紐帶的區域主義產生了密切的聯繫。

註釋：

[23]列寧：《亞洲的覺醒》，《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頁447。

[24]列寧：《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列寧選集》第2卷，頁449。

[25]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頁423。

[26]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頁428—429。

[27] 1889年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各種賦稅佔了純收入的70%，一個俄國農民交納的"賦稅"超過了他的貨幣純收入的一倍，"農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這麼高"，而破產農民即使想放棄份地還必須交納額外費用來"倒贖"份地。列寧《19世紀末俄國的土地問題》，《列寧全集》第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84-85。

[28] 關於俄國農業改革問題的討論，參見呂新雨《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視界》第十三輯，石家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頁143-215）。該文對列寧所謂"美國道路"和"普魯士道路"做了透徹的分析，這裡的相關討論援用了她的研究。在修改本文時，呂新雨教授提供了一些資料，在此特致謝忱。

[29] 《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寫於1907年11—12月，1908年在彼得堡付印，但沒有問世，被沙皇檢查機關沒收並毀掉，只剩下一冊，而且沒有結尾部分。1917年9月由"生活和知識出版社"重版，單行本刊印，列寧補上結尾部分。但1908年夏，根據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的請求，曾以作者身份為波蘭"評論"雜誌寫了本書的簡要介紹。見《列寧傳》上冊，蘇共

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集體編寫，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 204。

[30]列寧：《社會民主黨在 1905 年--1907 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89-391，392，393。

[31] 同上，頁 240,242。

[32] 同上，頁 278。

[33]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 427-428 頁。

[34] 同上，頁 247。

[35]對列寧來說，亞洲問題是和民族國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說，在亞洲"只有日本這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才造成了能夠最充分發展商品生產，能夠最自由、廣泛、迅速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這個國家是資產階級國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壓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卷，頁 511—512。

[36]早在 1905 年，列寧已經將"新火星派"的"革命公社"理念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相區別，他將前者斥之為"革命的空話"，而將後者與"臨時革命政府"這一"不可避免地要執行（哪怕只是臨時地、'局部地、暫時地'執行）一切國家事務"的、絕不能誤稱為"公社"的政治形式聯繫在一起。"臨時革命政府"意味著列寧正在思考一種新型的國家形式。見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一卷，頁 572。

[37] 第六十期《真理報》(2991 號：1925 年 3 月 14 日)，轉引自：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 16。

[38] 拉狄克在 1925 年回憶說："在一九一八年中國和俄國還被捷克人、社會革命黨人和高爾察克分割開來的時候，列寧有一次問到在那些移居俄國的中國勞動者中，是否可以挑出革命人士同孫中山接觸。現在我們已經同中國人民建立了聯繫。今天我們賦予中國革命者的使命則是擴大我們與億萬人民的接觸。"，同上，頁 16。

[39]列寧：《亞洲的覺醒》，《列寧選集》第 2 卷，頁 448，447。

[40]俄國知識分子的歐洲觀和亞洲觀顯然受到西歐近代政治發展和啟蒙運動的歷史觀的影響。在列寧的使用中，亞洲這一與專制主義概念密切相關的概念是從近代歐洲的歷史觀和政治觀中發展而來的。關於斯拉夫主義與西歐主義的論戰，參見尼·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第一、二章，雷永生、邱守娟譯，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 1-31，32-70。

[41]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65-67。

[42]1924 年 11 月 28 日，孫中山出席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舉行的歡迎會，並作此演說，因此，此次演說又稱《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見《孫中

山全集》十一卷，頁 401—409。

[43]孫中山：《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十一卷，頁 402—403。

[44]孫中山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為甚麼中國不能統一？其中的原動力，完全是由於外國人呢！這個原故，就是因為中國和外國有了不平等的條約，每個外國人在中國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享特別權利。近來西洋人在中國，不只利用不平等的條約來享特別權利，並且在那些特權之外妄用條約、濫用條約。... .."見《在神戶與日本新聞記者的談話》，《孫中山全集》十一卷，頁 373-374。

[45]例如，他積極參與了 1898 至 1900 年的菲律賓革命，兩次向菲律賓革命者輸送軍火，並深信菲律賓革命也促進著中國革命的成功。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事實上受到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中國革命的影響，儘管他們大多強調這一思想和革命的民族主義性質，而多少忽略其社會主義的特點。

[46]孫中山：《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十一卷，頁 408—409。

[47]孫中山：《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十一卷，頁 409。

[48]孫中山：《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十一卷，頁 409。

[49]孫中山：《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十一卷，頁 409。

[50] 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國民》雜誌，第 1 卷第 2 號，1919 年 2 月 1 日。

[51] 李大釗：《再論新亞細亞主義》，《國民》雜誌，第 2 卷第 1 號，1919 年 11 月 1 日。

[52]在這個意義上，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或李大釗的"新亞洲主義"與 1923 康德霍夫-卡利吉在《泛歐》一書中提出的以民族國家主權為前提的"泛歐"命題和更早時期已經形成的泛美組織也許有著某種呼應的關係，即這種區域構想不是一個保護性的區域組織，而是世界性的組織之下的地區組織。皮埃爾·熱爾貝：《歐洲統一的歷史與現實》，頁 28-29。

[53] 卡爾·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128-130。

[54]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 32-37。

[55]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頁 174-175。

[56] 參見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頁 68-69。

[57] 尾崎秀實：《蔣政權的衰退與新政權的前途》，《尾崎秀實著作集》，勁草書房版，第 2 卷，頁 323。見《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頁 176。

- [58] 尾崎秀實：《從國際關係看支那》，《尾崎秀實著作集》，第 1 卷，頁 197。見《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頁 184。
- [59] 田中武夫：《樸庵先生與〈滿洲評論〉的歷史》，《楠》（橘樸研究會機關雜誌）1977 年 1 月第 9 號，頁 45-46。見《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頁 206。
- [60]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頁 117。
- [61] 同上，頁 165。
- [62] 《北一輝著作集》第 2 卷，みすず書房，頁 292。
- [63] 同上，第 3 卷，頁 78-96。
- [64]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頁 171。（以上討論中引述和轉引的日文資料均經日文譯者核對原文。）

本文轉自人文與社會網站，原載於《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暉著，2008 年三聯書店出版）。